

## “后浪”焦虑与后撤型主体： 城乡视阈下的当代底层青年文化生态

岳森钰

2020年“五四”青年节前夕，“哔哩哔哩网站”（以下简称“B站”）推出宣言片《献给新一代的演讲——〈后浪〉》<sup>①</sup>。该片一经推出便取得近百万的播放量，转发量、收藏量持续攀高，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环球时报》、《新京报》、澎湃新闻、观察者网等知名媒体的联合发布下，“后浪”式青年更是不断提升网络热度，频频强势“出圈”。然而，在“奔涌吧，后浪”的呐喊中，“我们不是后浪”的呼声渐起，宣言片中过多的消费主义元素为部分青年群体所捕捉，“后浪”式青年主体形象逐渐受到质疑、颇具争议，尤其是围绕青年文化生态的主体精神走向与底层现实究竟如何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某种程度上，《后浪》作为年度现象级文化事件，其影响力远远超越了其作为“五四”青年节宣言片的辐射范围，成为备受关注的公共性议题。

从“垮掉的一代”到“后浪”式青年，近年来，主流叙述中的青年主体形象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与此同时，年轻一代拒绝被代表的呼声却开始高涨起来，自我命名与之发生严重错位，如“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青年自黑话语的流行，以及围绕“内卷”“打工人”“工具人”等网络热词展开的长达半年的热议，凡此种种文化现象都提示着底层青年问题在当代社会语境当中的争议性和辨析这一问题的迫切性。这些变化不仅暴露出青年所遭遇到的日益严峻的底层现实，更体现出新时代下青年主体建构方式的变化。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开启大规模进城打工的潮流，几亿农民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在这一潮流中，有些未成年人是乡村留驻者，有些青少年则携带着乡村记忆跟随父辈进入城市，或者兼而有之。在进城的青年中，有些人被其父母在时代时势状况中出于各种利益考量带入城市，试图凭借考试制度改变命运，有些人则主动选择进城务工补贴家用、增长见识。这些有过底层生活经验的青年（以村镇青年为主）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他们不仅是城乡差别、城乡冲突的肉身体验者，还是城乡关系剧烈变动过程中在社会阶层结构框架里不断涌现的新兴社群、新潮生活方式或新文学与文化现象的重要当事人。

但是，一如社会学学者贺雪峰所指出的，“当前中国城乡关系正处于剧烈重组时期”<sup>②</sup>，农民都想要进入城市生活，却又因种种原因无法在一线城市安家立命，便只能徘徊于自己家乡的县城。直至今日，底层打工人依旧面临“留不住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这一悬而未解的难题。因此，如何想象一种新的现代化生活，或是如何想象一个身心得以安顿、能够正确对待生活的主体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sup>①</sup> 《bilibili 献给新一代的演讲——〈后浪〉》（2020年5月3日），哔哩哔哩网站，<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V411d7u7?from=search&seid=8256519134096370231>，最后浏览日期：2021年6月20日。

<sup>②</sup> 贺雪峰：《城乡关系视野下的乡村振兴》，《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 一、此“浪”非彼“浪”：被遮蔽的底层青年

2020年5月3日，青年宣言片《后浪》由B站联合六家媒体正式推出，并于当晚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在宣言片中，作为“前浪”的国家一级演员何冰走上舞台，以青年宣言《后浪》寄语年轻一代，对当代青年在各领域的成就表示充分肯定。随后，“后浪”即成为热门话题，在短时间内迅速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既引发了强烈的共鸣，也导致了巨大的争议，进而带来一场全国范围内关于“前浪”“后浪”的社会大讨论。

此前，已有诸多学者对“后浪”现象展开学术反思，但以往研究大多更为关注宣言片的隐喻价值、符号意义、话语表征逻辑与传播效果等，侧重于思考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嵌入网络青年亚文化的文化策略，却未见就“我不是后浪”，即网友将“我们”与“后浪”式青年的生活进行自觉区分、以“不是”拒绝被代表的这一行为，加以特别注意和讨论的文章。基于此，本文关注被“后浪”话语所遮蔽的另一青年群体，即有过底层生活经验的青年群体，尤其是曾于城乡之间来回流动的村镇青年群体。

“我不是后浪”是年轻一代在拒绝《后浪》宣言片以代际视角对当代青年进行定义时提出的。在围绕《后浪》的讨论中，“奔涌吧，后浪”与“我不是后浪”的声音此起彼伏，宣言片里塑造的青年主体形象能否对当下社会的年轻一代进行有效概括，一度成为大众争论的焦点。相较于积极的赞扬与祝福，批评的声音显得尤为尖锐，其中，围绕“后浪”展开的批评意见主要有两种。其一，演讲视频中呈现的“后浪”生活实为消费主义的青年想象，无法呈现年轻一代在真实生活中遭遇的现实问题。视频中出现的出国旅行、跳伞滑翔、汉服电竞等消费主义体验实际上并不为当代青年所共享，因此，当年轻人遭遇现实物质生活上的差距及精神文化生活中的贫乏感等肉身体验时，《后浪》中“现代文明的成果被层层打开，可以尽情地享用”的说辞已不再具有有效性。许多看过《后浪》的网友正是在把个人的现实处境和片中的“后浪”生活进行对比时，自觉指认“我不是后浪，我只是个连饭都吃不饱的普通人”。其二，《后浪》宣传片在表现形式方面存在缺陷，演讲者何冰居高临下、屈尊俯视式的评价无法打动年轻人，不见真诚，反显谄媚。也就是说，“以‘前浪’之姿，冠‘后浪’之名”的表达策略不仅没有实现在年轻人和老一辈中间牵线搭桥的宣传目的，反而造成代际话语撕裂，还在某种程度上压抑了年轻一代的独立主体表达与自我赋权的可能性。

与围绕《后浪》产生的争议与质疑相互关联又相互映照的是，在《后浪》发布后不久，一系列通过模仿《后浪》制作而成的视频很快应运而生，获得了大量网友的喜爱与追捧。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短视频平台“快手”于2020年6月6日发布的周年宣传片——《看见》<sup>①</sup>，该片以“不要冷漠地走进普通人”为宣言，邀请平台重度用户素人“朝阳冬泳怪鸽”黄春生出镜，辅以诸多从草根角度拍摄的日常生活视频，呈现未被看见的普通人的生活，可视作与《后浪》的隔空对话。除了可以对标《后浪》的商业宣传片，一部展现另一种青年生活的个人视频录像——《或许，这才是大多数普通人的“后浪”》<sup>②</sup>，亦随着福建共青团的转载不胫而走。尽管其仅

① 快手正能量：《看见》（2020年6月6日），快手App，<https://video.kuaishou.com/short-video/3x49uc6z4487ejc?authorId=3xzm4cm5yxi55u&streamSource=search&area=searchxnull&searchKey=%E7%9C%8B%E8%A7%81&currentPcursor=>，最后浏览日期：2021年6月20日。

② 福建共青团（哔哩哔哩网站会员号）：《或许，这才是大多数普通人的“后浪”》（2020年5月6日），哔哩哔哩网站，<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z4y1R7u9?from=search&seid=5668354413398882671>，最后浏览日期：2021年6月20日。

仅只是呈现一个简单的画面：一位头发蓬乱、面容污秽的青年工人，在镜头面前絮絮不休地说着自己倘若能日入300块钱之后的愿望，却依旧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强烈同情与共鸣。

显然，在年轻一代的意识里，《后浪》中呈现的青年主体形象及其多姿多彩的消费生活，与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处境相去甚远，于是他们希望并要求存在一种作为普通人的青年主体性独立表达。因此，“我们不是后浪”的呼声实际上具有双重意涵，一方面是以“不是”拒绝“后浪”对“我们”的定义，另一方面则隐含着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对独立主体表达的愿望与诉求。

在年轻一代对主流以“后浪”这一高度一致化的形象涵盖青年群体的做法嗤之以鼻时，“普通人”的提法似乎存在某种揭露年轻一代生存状态的现实意义。那么其中就有一个关于被遮蔽对象的指称问题值得被讨论——当我们在谈论“普通人”的生活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所谓“普通人”究竟指向哪些看不见的群体？既然“我们不是后浪”，那么不能为“后浪”所概括的“我们”是谁？上述视频的流行表明，人们开始注意到，大多发出“我们不是后浪”呼声的年轻一代都曾共享着来自“底层”的生活经验，成为“新一代底层人”。

之所以要在底层人之前加上形容词“新一代”以作修饰，乃是基于该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底层”概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断更新。在这里，强调“新一代”，不仅意味着从代际更替视角出发、考量底层群体构成变动带来的社会结构性变化，更深层次的考虑则是同时强调在瞬息万变的当下，这部分青年群体的生存状态与个体困境的新变化。这些有过底层生活经验的新一代青年的出现绝非偶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沦为底层的过程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发生的。相较于过去的底层群体，新一代的底层青年群体不仅面临着既往的历史危机——在话语空间中被迫失声、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更面临着指向个人的主体性危机——在认同空间中走向迷失，彼此隔绝，互不相识。

## 二、“小镇”内外：底层青年诸种及其精神史考察

围绕《后浪》有很多质疑的声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面向是，它的描述是否足够贴合现实，是否符合当下时代的青年感觉。从个体经验出发，大家的“考证”热情都很高。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为什么相比于“后浪”，青年对“打工人”、对“小镇做题家”、对底层生活经验，似乎更“亲近”，更有“关注”的热情？这样的现象无疑也是一种“症候”。而青年对于“底层”生活的当下感受和所说话语之间会有什么样的碰撞，底层青年文化生态在当下正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正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

“底层”概念本身即依文化传统、地理空间、时代发展等因素的差异呈现出不同定义。一般来说，资源占有情况是界定底层概念最重要的指标，按照资源的分配状况来划分社会阶层亦是最普遍的做法。但即便如此，究竟采用何种理论视角来观察和界定底层概念也会导致其群体构成上的差异。在今天，当我们引入“底层”这一概念的时候，更多是从社会分层理论而非阶级理论的视角切入的。事实上，在19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以前，中国的文化语境里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底层”，“底层”的真正出现本来就是中国社会历史加速转型时期的产物。1996年，蔡翔发表《底层》<sup>①</sup>一文，文中那个弥漫着怀旧的忧郁气息的上海苏州河北岸棚户区，成为当时国内较

<sup>①</sup> 最初发表于2004年《天涯》第2期，后收入蔡翔的散文集《神圣回忆》中。选自蔡翔：《底层》，载《神圣回忆》，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27—37页。



早容纳城市底层工人的意象空间。由此，贫富分化、城乡对立的现实重新激活了“底层”一词在社会上的号召力和政治能量。2019年，李培林在《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 1978—2018》中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在经济社会方面的重大转变，我国原有的“两阶级—阶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sup>①</sup>“原来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构成的相对简单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现在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了。适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要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正在形成。”<sup>②</sup>一方面，农民群体数量锐减，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在大量农民选择进城务工、从事非农工作，成为流动的农民工群体一员的同时，工人阶级内部却出现了明显的社会经济地位分化，尽管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但其收入水平与社会保障却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群体不断产生，如“蚁族”“北漂”“海归”等群体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加强。李培林认为，当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具有相对稳定性，但“社会结构仍在转型变化的过程中，社会流动的频率仍然很高，社会仍然充满活力”。<sup>③</sup>

此外，长期以来，“青年”一直是一个没有明确定义而又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受国家地区、文化传统、历史阶段等因素的影响，该概念所指本身亦有所飘浮。截至目前，学术界较为集中的看法是将年龄作为划分“青年”这一特殊社群的主要指标，以成熟与否作为认定该群体的界定标准。即便如此，国内外学界关于青年的年龄界定亦有很大差异，具体到对青年年龄区间的界限规范及其依据上，也存在争议。

综上所述，“底层青年”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含混不清的，比如，用“底层”这一描述性的概念无法完整呈现其群体构成的丰富性和差异性，“青年”的界限与标准至今仍不明晰，等等。在尽可能明晰以上问题后，本文之所以依旧采用“底层青年”这一概念，不仅是出于理论分析的需要——让我们在面对当代底层青年文化生态时有总体性的把握，还因为“底层”这一概念乃是“后浪”现象中被遮蔽的青年群体用以身份定位的常用话语。在他们的叙述里，所谓的“底层”经验常常出现在一个更为具体、准确的空间——“小镇”中。这个“小镇”并不特指某个具体的场所，也不仅仅意味着夹杂在生活空间的两端——都市与乡村——之间的地理空间，而是个抽象性的概念，它指向的是一个存在太多不同形态的半边缘地带，因而也孕育出颇具差异性的“底层”经验，将之横向对比，隐约可以呈现出一条底层青年的精神史轨迹。

### （一）从“杀马特”到“打工人”

本来看了《后浪》有点小激动，但总感觉哪里怪怪的，还好立马看了朱一旦的《非浪》，这才找准了自己的位置。

心是热了但是我却很清醒知道自己的定位。

心里有火，眼里有光，兜里没钱。……时代很美好，但同时时代的悲剧亦如影随形。……很成功的演讲，如同鸡血，打了鸡血才更有力量。感谢兴奋的口号，空洞、盲目、忙碌地活下去。

……………

这是在宣言片《后浪》的评论区出现的留言。类似的留言有很多，它们勾勒出一代青年的

① 李培林等著：《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 1978—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25 页。

② 李培林等著：《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 1978—2018》，第 2 页。

③ 李培林等著：《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 1978—2018》，第 13 页。

普遍感受。《后浪》中的图景描绘出当代青年所处的优渥环境——“现代文明的成果被层层打开”，而这一切在与评论区的互相映照下，更加突出了年轻一代的失意与落寞。想想这种一面热血沸腾、一面冷水扑面的双重感受，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不会有，那时是各种社会思潮蓬勃发展的时刻，青年一代渴望思想与表达的自由，对未来充满希望，尽管有迷茫、困惑，却不存在个人命运终局已定、徒劳无功的感觉。

面对当代的中国，青年群体一方面豪情万丈，在新时期的繁荣局面下，开始真的敢于相信改革开放时期所期待、希望的一切真的有可能实现，世界的重任落到了中国的肩上；另一方面，实际中青年人的现实处境则是严峻的，因此既有激情，又有落寞。事实上，这种感觉不是在当下突现的，而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从“奔涌吧，后浪”走向“我不是后浪”是一个撕裂现实的过程，正是这种现实的撕裂，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各界对底层青年群体的关注。纪录片导演李一凡多年来始终想要关注城乡关系中有关城市化进程与人的代价等问题，借此机会，2020年10月底，网络演讲节目《一席》邀请了李一凡作为嘉宾，向观众讲述他拍摄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的经历，为曾一度消失在公众视野里的“杀马特”提供了一个站到舞台上说话的机会。<sup>①</sup>

让杀马特自己站到镜头前讲话为什么这么重要？这必须从李一凡多年前的一个错觉开始说起。2012年前后，李一凡正致力于一些关于提倡抵抗主流审美价值的艺术计划。当他从网络上初次了解到杀马特群体时，他感到非常兴奋。不同于大众对杀马特的嘲讽和戏谑，他认为，杀马特的出现宣告着中国反消费主义的审美自觉，并将其社会行为视作一种文化抵抗。<sup>②</sup>于是，李一凡当机立断，要拍摄一部记录杀马特历史的纪录片。然而，很久以后，当李一凡第一次在东莞金丰溜冰场见到现实中的杀马特时，才意识到，当初的自己并未接触到真正的杀马特。

什么又是真正的杀马特？在李一凡的镜头里，他们是头顶夸张发型的青年工人。他们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中西部地区农村，集中于东莞市石排镇，“杀马特的主体是90后农民工，几乎都是农民工二代。他们都有留守儿童经历，绝大部分人有中小学辍学的经历，初次进厂打工的平均年龄在14岁，最小的只有12岁”。<sup>③</sup>出于生存的需要，出于对外界的好奇，同时也出于逃离农村的冲动，杀马特青年成群结伴地涌入城市，开启新的生活。然而，如愿进入城市，并没能让这些青年高兴起来：城市没有容纳他们的空间，年龄过小、身份缺失导致他们没有工作机会，现代化的环境也让他们倍感迷茫，丧失了基本的生存能力。在此情况下，大多数杀马特青年都做了同样的选择——成为临时工，进入工厂生产流水线。

正如李一凡所言，“每个杀马特的故事都和工厂密切相关，不懂工厂就不会明白杀马特”。<sup>④</sup>在纪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工厂里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空间，用杀马特教父罗福兴的话来形容，

① 一席：《我拍了杀马特》（2020年11月5日），一席网，<https://www.yixi.tv/zhiya/22#/speech/detail?id=917>，最后浏览日期：2022年2月20日。

② 李一凡在访谈中提到：“我很难理解，一拨人为什么主动黑自己，作践自己，把自己搞得很丑，骂自己是傻逼，调侃自己的‘贵族’称号。这些持续了那么长时间，有那么多人参与，这不就是一种文化抵抗吗？”参见赵景宜：《李一凡：杀马特工人和城市白领，两者的压抑非常类似》（2020年11月30日），网易网，<https://www.163.com/dy/article/FSMBGTBF0534A4SE.html>，最后浏览日期：2022年2月20日。

③ 李一凡导演：《杀马特我爱你》（纪录片），该片于2019年12月在广东时代美术馆上映。

④ 李一凡导演：《杀马特我爱你》。

那是让他们“感觉活在一个牢笼里”的地方：工作环境和上工条件十分恶劣，环境安全、卫生不达标；长期从事高危的机械重复性工作，机器将手指磨平，下班后幻听或耳鸣，甚至“很多人断手断脚都并不算稀奇”；没有严格的休息时间，加班到凌晨是常态；容错率与薪资极低，罚款比报酬高出数倍，常被上级批评辱骂、拖欠工资。更残酷的是，杀马特青年一旦选择留在工厂里，就很难再度抽身。一方面，由于年龄过小，《劳动法》无法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工厂便以工期太短为由不发放工资；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意识到，凭借自己的年龄、劳动水平和文化程度，很难再找到新的工作。于是，尽管他们心有不甘，却不得不任由工厂将自己拴在流水线上。

上文提到，拍摄初期，李一凡导演曾把杀马特文化看作一种“反击的文化”。然而，从纪录片中所隐含的工人视角，观察被随意拼贴的工厂景观，“看见”杀马特青年的现实状况，我们会马上发现，在对杀马特身体改造与社会行为的看法上，可能不复我们想象的具有那么强烈的主动性。所谓的“文化抵抗”“审美自觉”大多都是知识分子的错觉，驱使大多数打工青年加入杀马特群体的原因，与他们对城市、工厂和自我的朴素认识有关：

·外面太乱，我们太朴素了，怕被人欺负，搞发型、搞文身，看起来要凶一点，也有好看的心理，也有害怕的感觉，搞个发型像个小古惑仔一样。

·虽然别人不是从心底里关注你，但是他的那种关注是异类的那种关注，就看得到你那种嘛，所以说就比较喜欢这种。走到哪里，只要有人能看得到你就行。

·从小很孤单的话，就想要有那种被别人关注的一种感觉。我玩杀马特有那种感觉，有一点伤感。

·我慢慢地接触到他们之后，我就觉得，我的人生要发生一些改变，我的人生要我来做主才行，哪怕是错的。

·最主要是女孩子喜欢，女孩子喜欢什么样子，我们就变成什么样子。

仔细看这些回答，恐怕会让人大跌眼镜：在杀马特青年另类张扬的外表下，竟然隐藏着一个个如此脆弱的主体。他们对自己在社会中的被动位置有着极其清晰的认知，大量的打工青年之所以选择加入杀马特，乃是基于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另外，他们还注意到，作为普通的打工青年，他们的付出与所得显然不成正比，故罗福兴有了如下感悟：

我觉得我在这厂里面打十年工，我也是普工，我甚至没有上升的机会，一样的。我在忙杀马特的话，我有上升的机会。首先我们已经活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了，所谓的避风港世外桃源了，这里面有这个身份的话，我很容易获得。比如杀马特贵族，贵族这个称号我能获得，这个身份我能获得，虽然是虚幻的，但虚幻的我在里面是很开心的。在工厂里面的话，我剪的跟你一样的发型，只会默默无闻地在一条流水线里面工作，对，在里面的话，更高的工资也是不可能的东西，比方说我本身的学历，是吧，教育，我的教育就这个水平，他给不了我。说难听点吧，就给你这个职位做，你也做不了。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工厂也好，在什么地方上班也好，没有上升的机会，这些机会可能只会留给一些大学生，或者一些研究生之类的。并不是说留给你们这种从农村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如干脆选择另外一个渠道，虽然这个东西是虚幻的，但我觉得这个是快乐的东西，快乐的，我觉得是一样的。<sup>①</sup>

① 李一凡导演：《杀马特我爱你》。



在这段逻辑有些混乱的表述中，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杀马特青年实际上充分意识到了其主体性建构的虚幻性。他们深知，选择“上升的机会”，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选择，但由于选择的权利是与个人的能力、家庭出身等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故他们天然地被剥夺了进入城市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从工厂得来的微薄薪资，也不足以支撑他们获得消费社会中既有价值秩序里的快乐。因此，选择成为杀马特，即选择了某种精神上的主体性，尽管他们已经察觉到那是极其脆弱的。

了解了这些，我们可以想象十多年后的杀马特青年回顾青春岁月时，其内心是百味杂陈的。在2013年以前，杀马特曾作为一个时尚的标志得到迅猛发展，并且在主体性自我言说的层面，是“一个人的革命”。而今，杀马特青年早已销声匿迹，疯狂流水线上的青年工人也寥寥无几。

## （二）进退维谷的“小镇做题家”

同样是从村、镇出发，外出务工的底层青年群体在抵达工厂后转而另寻一片天地，进城求学的底层青年学子则在城乡之间不断辗转、徘徊，成为“小镇做题家”的一员。

2020年年中，一篇自媒体文章《小镇做题家：一个211高校学生的命运陷阱》<sup>①</sup>爆红网络。该文讲述了出生于四川某县城的农民工之子赵韦为改变命运，通过高考制度成功逆袭，最终考入211高校、走出小镇的故事。若只聚焦于故事的上半部分，赵韦的人生不过是又一个“寒门出贵子”的励志故事。然而，步入大学的赵韦在如愿获得梦想中的生活之后，却在假期陷入对城乡环境切换的极度不适，更在毕业之时深感焦虑与迷茫，人生的走向逐渐偏离理想的轨道。最终，赵韦在父母的要求与逼迫下，回归工地，“成为‘小镇做题家’，一开始是他的出路，现在是一种嘲讽”。

“小镇做题家”是近期出现的又一新的底层青年文化群体，指的是那些出身小村镇，埋头苦读，擅长应试，拥有高学历，但缺乏一定眼界和资源的青年学子。“小镇做题家”的一个思考前提即“知识改变命运”，认为考试制度是底层人民实现阶层跨越、形成身份认同的有效路径，但“985废物”“学术垃圾”等自嘲式命名的大量涌现则成为“读书无用论”的有力论据。

赵韦的出身与大多数“小镇做题家”一样，尽管诞生于底层家庭，但并未自幼在村镇里生活。赵韦的父母都曾是传统的农民，为了改善物质生活条件，他们从四川县城的老家一路跋涉，抵达东南沿海的工业城市务工。数年以后，又为便于儿子通过原籍高考以加入流动的上升渠道，进而过上“更好的生活”，赵韦的母亲选择带着儿子回到老家。用赵韦的话来说，“回到小城，是为了日后离它更远”。“留不住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这条返乡之路注定崎岖难行，它是以上一辈的牺牲铺就的：赵韦父亲早在他高二时因工伤，丧失劳动能力无奈返乡；而赵韦母亲则无奈身兼多职，在为生计奔波的同时，又揽上照顾丈夫与孩子的重任。

作为在这种返乡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赵韦后来自觉背负上家庭的重担，决心考上大学、追求走出大山其实是与其底层出身密切相关的。但是，赵韦面临的困局就在于，正是这一出身使他决心出走，最终却又将他拉了回来。可以说，赵韦面临的现实困境其实在于群体性的上升流动渠道的日益萎缩对底层人民的个人命运轨迹造成的冲击。改革开放后，高考制度恢复，在新的政策指导下，青年经由教育走向社会的道路再次被打开，这使“知识改变命运”的思想再

<sup>①</sup> 陈晓妍：《小镇做题家：一个211高校学生的命运陷阱》（2020年6月3日），“真实故事计划”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BXIShM8Rx9owrI\\_Cvwf\\_w](https://mp.weixin.qq.com/s/BXIShM8Rx9owrI_Cvwf_w)，最后浏览日期：2022年2月20日。

度在诸如赵韦的父辈群体中形成烙印。从某种程度上说，赵韦实际上是这一思想逻辑的直接承袭者，这种基于生活经验得到的朴素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指引了赵韦对于个人发展的规划。正是在父母的反复鞭策下，赵韦的心中始终铭记着返乡之初母亲的提问：“不上大学就永远和我们一样，你愿意吗？”

现实的情况远不如想象中的乐观，在毕业之际，赵韦面临的是对口专业工作难找、个人兴趣与就业生存的冲突等诸多更为紧迫的现实问题，学历成为废纸、再度沦为出身低下的底层人成为当代新穷人群体之殇。最终，在极端的焦虑下，赵韦患上抑郁症，“赵韦觉得自己像河里的一条鱼，被硬捞起来放在海里”。

对于赵韦来说，尽管辽阔的海可以成为他遨游的空间，但河鱼的身份注定了他真正的归宿只能是湍急的河。赵韦话语中所透露的这种关于出身与命运的理解，亦在文末的评论席中有所补充：

我的父母很善良，很爱我，活得很小心，后悔没能好好教育我，没能在成长路上给予我更多帮助。他们有他们的局限，但能给我的已经是最好的了。只是他们的局限影响了我很多，我也有我的问题。我希望我的父母平平安安，以后的路我会自己走。

也就是说，尽管赵韦对上一代人性格中的美好基质予以肯定，也在主观上清醒地认识到有所局限的父母已竭尽所能，但最终他还是将不幸的后果归因到原生家庭上。赵韦这种“原生家庭决定论”的思路，对某种超越于当下的眼界与选择的追求，以及频频受挫后对个人能力的怀疑，促成了他对个人命运的发展采取了这样一种理解。事实上，这并非他所独有的观念，而是为当下很大一部分底层青年群体所共享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小镇做题家”所背负的精神苦难甚至远远超过其父辈群体，“学霸”称号与励志故事使他们光环加身，难以像普通的底层青年一般接受社会安排，而一直以来逐步上升的成长环境所提供的学院思维也使他们不具备投入资源不均的社会竞争的思想与技能准备，于是无意识的螺旋式循环“内卷”行为成为其缓解迷茫、焦虑与痛苦的手段，由此产生的强烈的认同危机最终形成了他们自嘲式的心态。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种观念为“小镇做题家”们开辟一个新的认同文化空间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前提。

随着赵韦的故事得到越来越多网民的关注，“小镇做题家”这一网络热词爆红，其背后的词源地也随之浮出水面。2020年5月10日，豆瓣小组“985废物引进计划”建成，以一种颇具自嘲式意味的“98five大学”命名，在短短数月间，该组已聚集10万多名成员。组内明确规定，入组成员“必须是目前遇到了困境的five”，他们拒绝一切“凡尔赛文学”，并主张发帖自述“不符合five定义的将视为炫耀”“避免暗戳戳炫耀”，同时禁止保研推免生发声，抵制学历攻击、“学历无用论”等。迄今为止，这一网络自留地已经成为包括赵韦在内的“985、211失学失业者的新校园”，“小镇做题家”们以“98five”的身份聚集起来，向失败困境发起挑战。<sup>①</sup>

“985废物引进计划”可视作“丧文化”背景下的又一历史产物，这个网络空间看似是一个失败、失意者发帖自述、寻求共鸣的抚慰地，但仔细分析组内发帖成员的讨论，可以发现其自嘲式的命名背后，包含着其主体性重建的想象。在小组成员看来，小组建立的初衷是“分享失败故事”，希望从真实的个体故事中获得共鸣，减少迷茫，重拾对未来的信心，但与此同

<sup>①</sup> 《总吧规 2020.11.15【11.15更新12条组规老five为何被删帖封禁阅后请回“dd”】》（2020年8月2日），豆瓣网，<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87390037/>，最后浏览日期：2021年6月20日。



时，管理人员亦声称该小组“不聚焦失败”，旨在“交流信息，一起学习考公考研打卡”。换言之，“讨论如何脱困”或许才是成员们自嘲的最终指向。而这种重整旗鼓、逆袭翻盘的想法，在现实的人生选择上就投射为集体考取研究生或者公务员的行动。从这一层面来说，所谓的“小镇做题家”，实际上比那些不问过往、不问去向的人表现出更加负责地对待自身内在精神困境的态度：一方面，他们试图通过自嘲式命名以抵御外界的质疑，通过否认的方式反对“学历无用论”，进而保护过往的自我；另一方面，此种自嘲式命名亦成为每一个身处其间的失败个体在面临困境、需要产生共鸣以告慰自我时所借用的工具。

然而，问题在于，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一个单一主体都能通过降低期望，承受住从“天选之子”到“985废物”的颠覆性主体想象带来的强大的道德压力。即便这种压力能够转化为一种争做时代强者的动力，在现实生活中考公、考研等方式是否能够成为大多数“小镇做题家”进行自我救赎的有效途径仍然值得质疑。从当前的文化现象来看，持续一年多的有关“内卷”现象的热烈讨论证实了提出这一怀疑的合法性，非理性的内部竞争仍然显而易见，大量的现实案例表明，“小镇做题家”在顺利升学、进入体制或者进入大型企业工作以后，仍无法在既有的社会价值体系下找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社会位置，自由地选择自己热爱的生活。相反，认清现实后躺平任嘲的现象比比皆是。

从这一角度看，当代底层青年文化之发展或许就更具有一种精神史意味。从“杀马特”到“打工人”，从“学霸”到“小镇做题家”，从主体性建构到群体性自嘲，这就是二十余年间底层青年思想和精神指向所发生的改变。而在其间起着关键作用的，或许就是改革开放历程中的现代性发展。透过对比《后浪》演讲词中的青年想象与底层青年群体的现实状况而呈现出的话语裂隙，更为重要的问题可能是，如何理解主动性日趋衰弱的当代青年主体形象？正是从这里出发，本文拟拉开批判分析距离，转向一种宏观分析。

### 三、后撤型主体及其潜能

从1900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到2020年B站发布的《后浪》，我们从百年来中国社会公共视野里青年的形象变化看到了21世纪以来的当代青年。20世纪，投身救亡图存的革命是青年理想的自我实现方式，青年作为极具能动性的主体，被融入朝气蓬勃的青春话语中，成为文明的创造者。百年以后，当代青年被日益纳入资本主义市场理性逻辑之中，往往只能作为消费的个体出现。这也意味着曾经从古老传统中挣脱出来的新鲜力量已然不复曾经那般具有主动性，反而以一种倒退姿态消失在众语喧哗的历史空间。

如果说以往的青年文化呈现出的是朝气蓬勃、有着无限激情与热爱的主体性状态，那么现如今，青年文化则生成了一种极具暧昧性、矛盾性的当代青年主体状态——后撤型主体，他们既仿佛具有某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又具有严重的退缩性焦虑。

其首先表现为普遍流行的躺平任嘲的心态。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过程中，由不确定感引发的焦虑使人们越来越难以接受无法找到社会位置的自我，于是，“态度决定成败”等成功学的启迪被抛诸脑后，取而代之的是不完美时代的到来。“小镇做题家”“985废物”“打工人”等纷纷集体登场，人们逐渐开始转向对多元化价值的追求。不少人意识到，与其追求难以兑现的人生，不如认清现实，趁早“葛优躺”。

与之形成矛盾的则是不断发生的“内卷”循环。由于在大多数人既有的价值观里，“普通”

实际上带有碌碌无为、随波逐流的贬义，正如那句流行语——“为什么有些人明明那么普通，却又那么自信？”接受普通，也就接受了自己是“时代之下一棵草”的定义。因此，为摆脱“普通”的标签，青年们又在不断暗暗发力。从这一角度看，青年群体主动进行自我剖析的姿态并非指向对成功学背后的经济、地位的拒绝，而是进一步体现在“普通学”的盛行之中，表现为盲目追随消费主义社会的风尚、屈从于现代社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丧失基本批判力与行动力等焦虑状态。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在分析技术革命对人类冲击过程的影响时指出：“新平台、新的软件形态、新的文化形态、新的文化生产、新的文化传播，似乎给我们一种期待——我们将经由新媒体而看见，世界将经由新媒体重新变为多元的、丰富的和可见的。”<sup>①</sup>这种期待显然是值得怀疑的。当下，新媒体时代已进入大数据阶段，各新媒体平台已具备精准推送的技术，能够实现各用户群的量身定做。然而，在技术的革新为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便捷的同时，数据化精准推送也在基于个人趣味，不断缩小可视化范围，进而导致人们思维的禁锢与眼界的狭隘。以抖音、快手等在文化生产与消费中占据巨大份额的媒介平台为例，只要用户在浏览信息的过程中，通过点、划或者视线停留表现出对某一个主题的关注，很快就会发现此类内容越来越多，目不暇接。戴锦华因此亦对这种期待表示深刻的怀疑：“在多少时候，我们经由屏幕去看？在多少时候，我们是想在屏幕上看到自己？在多少情况下，我们的目光是望出去的？在多少时候，我们的目光是内投的？”<sup>②</sup>纷繁的“数据森林”中折射出来的是社会个体对自我的过分关注。无论是低头族的沉醉还是手机党的痴迷，都表明个体与历史的联系被切割了，人们对于他者的关注也被分散了。

于是，当代青年看似共享着消费主义塑造的伪多元社会的文化，实则却遭遇着城乡分化下断裂社会的现实。在这里，“断裂的社会”不仅是城乡的断裂、阶层的断裂，更是底层群体间每一个具体的人与其他人关系的断裂。

一方面是出生于村、镇的底层青年群体“看见”了城市的消费生活。在过去，由于城乡流动的限制和新媒体技术的不成熟，出生于村、镇的底层青年长期生活在农村，并不能接触到城市，也无法通过直接的对比感受到不同生活方式的差异。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政策的松动，以及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可以直接进入城市、感受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现如今，即便是隔离管理的工厂，也无法抵挡底层青年对这种绝对的生活差异的认识。例如，在抖音、快手的短视频空间里，充斥着大量娱乐化、游戏化的现代生活景观，媒体让更多的所谓“普通人”的生活浮现在人们眼前，这些生活却多是通过晒旅游、晒美食、晒穿搭等消费主义元素呈现的。

另一方面则是“底层”出身的知识分子再度“漠视”了真实的底层生活，丧失了一种整全性的中国视野。在媒体的改造下，同时也是在他们的默认下，即便是底层青年极为熟悉的农村景观，现在也早已成为一个陌生的地方。例如，在著名自媒体博主李子柒的镜头里，贫乏的农村早已为田园牧歌式的唯美画面所遮蔽，成为现代城市居民的精神故乡。在大数据推送的限制下，他们不能看到或许也不想看到底层人的生活。

① 活字文化：《戴锦华 | 新技术革命，能否使我们看见更多元、丰富的世界？》（2021年5月6日），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464864550\\_268920](https://www.sohu.com/a/464864550_268920)，最后浏览日期：2022年2月20日。

② 活字文化：《戴锦华 | 新技术革命，能否使我们看见更多元、丰富的世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文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生活结构性问题的分析与批评，并不指向呈现为后撤型主体形态的底层青年群体本身。之所以称其为“后撤型”主体而非学界所普遍使用的“退缩型”主体，乃是基于对其历史局限性的清晰认知。事实上，青年在主体性建构方面呈现出的后撤姿态，实则是高度策略性的，其中或许也包含着一种新的契机，昭示着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生态的历史向度。

自 21 世纪以来，已有部分青年开始有意识地在精神层面抵抗消费主义的俘获，即使是在被自嘲文化氛围笼罩的当下，大多数人尤其是底层青年一代仍然表现出极大的政治潜能与集体意识。例如：在拼多多事件中，前拼多多员工“王太虚”借用自媒体平台揭露平台资本对底层员工的剥削；在 B 站“墨茶事件”中，UP 主“御坂伊里奇”及其他热心网友对底层青年“墨茶”的关注虽然不乏网络情绪的裹挟，但在这些青年身上，我们看到追寻真相、追寻正义、追寻平等的抵达，追寻乌托邦理念的现实实施的一种巨大共识和热情。他们一面谈论着工资、房价、娱乐八卦，一面清醒地意识到消费主义与审美主义的霸权，涌动着逃离庸常生活的遐想。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或许可以从重建社群生活的角度去重新思考当代青年文化生态。例如，在温铁军等《乡建笔记：新青年与乡村的生命对话》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自 2001 年开始的新乡建运动中不乏当代青年的身影，在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等组织的支持下，不少青年人积极投入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积极探索、实践，寻找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sup>①</sup>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群青年正是诞生于“大平原时代”的“游牧青年”，他们的出现意味着已有部分中国青年正处于摆脱原子化的个人生存和奋斗阶段，转而寻求一种集体性的社群生活。

此外，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基于成本考虑，产业转移到下沉市场和线上兼职平台，大量数字化新就业机会拓宽了县城的就业容量，给生活在其中的青年群体提供了新的可能。根据瞭望智库联合蚂蚁研究院、华中师范大学农村研究院农村妇女研究中心的最新返乡调研资料显示，“中国小镇正在重新热闹起来”。<sup>②</sup>一批批出于无奈选择返乡就业、创业的小镇青年在回家以后惊喜地发现，固然存在“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但县城为他们留有一席之地。除了大量的数字化就业机会带来的收入红利，国家大力推进的新型城镇化也在政策上为他们提供了诸多便利，零门槛的落户政策既使他们的身心得到安顿，也让曾被分隔开来的家庭得到再度整合。也就是说，在中国城乡发展的现实语境中，青年主体的“后撤”具有了战略性的意义，它为当代青年退出以大量的资源消耗为基础的现代生活，撤回到一种和谐、健康的家庭伦理生活，提供了现实土壤。

因此，就中国城乡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通过配合国家政策与社会引导，发挥当代青年的主体性潜能，使其进一步摆脱以消费主义作为主要形态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生活想象、转而构造另一种现代化生活，无疑具有极大的可能性。而在这个意义上，主体联合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便成为当代青年文化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另一重要问题。

#### 四、结语

<sup>①</sup> 参阅温铁军、梁少雄、刘良主编：《乡建笔记：新青年与乡村的生命对话》，东方出版社 2020 年版。

<sup>②</sup> 《重新热闹起来的中国县城》（2021 年 2 月 19 日），“瞭望智库”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iWIPv3IP4q-DNSLYYUHegw>，最后浏览日期：2022 年 2 月 20 日。



当充斥着消费主义元素的画面替代真实的底层生活时，当“选择的权利”与被迫谋生遥相呼应时，当主流文化试图用“后浪”为当代青年群体冠名时，“我们不是后浪”的呼声让我们将视线转向被遮蔽的底层青年群体。将他们置于中国城乡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正在塑造一个主动性渐趋渐弱的当代青年主体形象。

本文通过个体的自我叙述回顾底层青年群体的个人史、精神史，并在其主体性的建构与想象中，把握他们真实的现实处境与精神状况。经过考察我们发现，数十年前，在杀马特青年的夸张发型、怪诞穿搭背后隐藏着一个个极其脆弱的主体，正是因为充分认识到了个人出路的有限性，他们最终“选择了放肆，选择了自由”。为什么杀马特青年亚文化能在2013年前成为一个时尚的标志，迅速火遍各大社交媒体？因为它似乎提出了一个“另一种主体”的可能性：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获得多少认可、赚取多少薪资，而在于对快乐、自由的追寻，尽管它最终被证明只是一种基于现实的无奈选择。现如今，曾经的工厂青年们纷纷“追随”杀马特青年的脚步，逃离工厂，另寻一片天地，却依旧沦为“打工人”一族。与此相对应的是，“小镇做题家”及其他自嘲式命名的出现，表明在青年身上已然出现较为严重的自我认同危机。在退缩性焦虑的影响下，自嘲式命名作为一种交流媒介，为青年进行知识补充、实现阶层跨越的上流之路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形成了具有消解功能的自我保护机制与友善交流的联系场域，具有主体性想象的重要意义。不过，这种自我拯救的尝试仍具有局限性，其“向后撤”的姿态表明它与有意识的能动性实践之间仍有较大距离。

纵观百年间进入公众视野的中国青年主体形象，从《少年中国说》到《后浪》，青年文化呈现出的主体形态呈现出颠覆性的变化。在新媒介时代的语境下，一种后撤型的主体悄然生成。但无论是部分青年在精神层面抵抗消费主义的俘获、作出重建社群生活的努力，还是中国县城在小镇青年返乡后的焕然一新，我们都足以窥见当代青年群体的主体潜能。正是从对这种主体潜能的期待出发，我们有理由相信，以新技术革命与新型城镇化为契机，一种有助于当代中国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给定位置的当代青年文化正在孕育之中。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研究生